

芙蓉姐姐·三俗现象·媒体的责任和良心

姚雪岚

芙蓉姐姐现象发展到今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一是由其“出世”所代表的中国媒体“三俗倾向”，二是可以通过她在媒体上的最终沉寂去透视中国媒体的发展方向。

芙蓉姐姐蹿红于2005年的网络，盛极于2007年的各类媒体。芙蓉姐姐的蹿红说穿了就是一场当事人（芙蓉姐姐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和媒体各怀鬼胎、各有目的的互相炒作和利用。芙蓉姐姐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媒体获得名利，是古往今来极端名利一族的追求：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媒体利用一个可怜的病态之人则获得了眼球效益和随之而来的更为重要的经济效益，甚至可以改变传统对悲剧的定义：我们过去只知道“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现在我们知道了将人生无价值之物当做有价值的东西得意洋洋地展示给人看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剧。

“芙蓉姐姐”现象下是三俗现象在中国媒体的泛滥：芙蓉姐姐未去，菊花妹妹、红衣主教登场，甚至木子美们用自己的身体和隐私书写出名利的“辉煌”；一边新闻主播义正辞严揭露某某虚假广告，几分钟后的广告时段堂而皇之的该广告照常粉墨登场。

更有甚者：国外有直播老虎如何吃人的事件，曾经的杨丽娟事件台前幕后媒体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成都孙伟铭醉驾死刑初判又有多少成份是媒体的推波助澜？孙的妹妹身怀有孕而被媒体当街狂追“采访”的场景又与“吃人”式直播多大差异？所谓情感故事栏目全国性走红，又是建立在多少将隐私暴露甚至“导演”给人看的基础之上？

最惨烈的：某台记者采制英模节目，非要拍摄手术后英雄血淋淋的身体和伤口；2008年5.12地震直播，有一位女记者采访刚刚送上飞机的伤员，对方气息奄奄，她却一再要求伤员在生命垂危之际为自己的节目煽情：你妈妈在这里，你一定要给你妈妈说点什么！

难怪这种怪异的文化现象会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愤

怒。从2007年至2008年，仅仅因为邀请了芙蓉姐姐做嘉宾或评委，一些很火的栏目就此下马，多少人多少年的心血就此付诸东流。而芙蓉姐姐，也因此淡出中国媒体。但是，仅仅靠“封杀”或其他行政措施，也引起业界和社会的争议——行政干预究竟是否符合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如何规范才更为有利有力？

三俗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媒体的角色转变。

中国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担当一个纯粹的角色：党和政府的喉舌，宣传舆论工具。这个时间段的中国媒体身份特殊地位优越，一级媒体相当于同级政府的发言人，媒体所言所及，或代表政府宣示政策法规，或代表政府臧否人物事件，令当事单位及人物无不惶惶惶惶。

曾几何时，中国媒体的角色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单一的政治传声筒和党与政府的喉舌，到兼具大众公器、娱乐和游戏的功能；既要充当党的宣传工具又必须面临商业化和市场化操作；它的内容和话语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它的生存依赖于市场的空间。于是，收视率成为一些媒体追求的终极目标，成就了“眼球效益”催生经济效益的公式。毋庸讳言，这应该是中国媒体的一大进步，双重身份的出现让中国媒体走下了神坛、圣坛，更好地走进生活、走进民间、从而获得更多“人化”、“平民化”的特质；同时，双重身份也容易让另一种倾向从另一端扭曲、腐蚀、甚至破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直至形成今天的所谓以芙蓉姐姐现象为代表的“三俗”现象。

杜绝三俗现象的办法必须依据中国媒体的这一身份变化去寻找：在坚持政府指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唤醒和建立中国媒体的责任和良心。

坚持舆论导向无庸赘述；当中国媒体运用“人”的责任和良心作为手段去规范“人化”、“平民化”后的中国媒体，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面对一个事件，面对一个人物，面对收视与负面（下转第92页）

（上接第 58 页）

影响的矛盾，面对金钱和良心，媒体和媒体人要养成一个习惯，多问一句自己：该不该这样做？该不该这样报道？

在中国媒体双重身份下，它的责任包含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两个方面。媒体的政治责任可以由传统的“舆论导向”去规范和完善，但媒体的道德责任则可以通过唤醒和建立媒体的责任和良心去实现。两把利剑，两种方法，犹如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舆论导向”包含了最

低层次的责任和良心；责任和良心可以约束的范围则远远超过“舆论导向”的指向范围；一个媒体一个媒体人，如果一旦触犯了“舆论导向”的雷区，将不复存在；但良好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修养则可以让一个媒体、一个媒体人永远不去做损害国家、社会、他人的事情，也就会永远远离“舆论导向”的雷区。

双剑所指，乐见中国媒体发展壮大。

（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